

划定高深知识的边界:高等教育哲学的使命

——读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

熊华军,梁晶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摘要:高等教育哲学的使命是对高深知识的规定。在高深知识的性质上,布鲁贝克认为,政治论高深知识与认识论高深知识既有其内在合理性又存在不足之处。在高深知识的传播对象上,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各有利弊。关于高深知识传播的方式,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都不能被相互取代。学者作为高深知识探究的主体,只遵守外在规范或只坚持内心信仰,只崇尚学术自由或只强调学术责任都有失偏颇。在划定高深知识边界的基础上,布鲁贝克重构高等教育哲学的大厦。布鲁贝克认为,高深知识是认识论高深知识与政治论高深知识的统一,精英和大众二者同是高深知识的传播对象。在传播方式上,布鲁贝克主张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二者融合。学者要既遵守外在规范又坚守内心信仰,在探究的方式上,学者要平衡学术自由和学术责任二者的关系。

关键词:高深知识;高等教育哲学;学术规范;学者信仰;专业教育;普通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2-8742(2012)01-0101-09

在博德尔(Heribert Border,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大学著名哲学教授,海德格尔弗莱堡的晚期著名弟子)看来,哲学是关于理性的规定,即哲学的使命是划定理性的边界,然后在理性的边界上建构哲学^[1]。从博德尔的思想出发,高等教育哲学的使命也是规定和区分,不过,它是关于高深知识的规定,即划定高深知识的边界。约翰·S·布鲁贝克(John S. Brubacher)在《高等教育哲学》这本书中,在划定高深知识的性质(高深知识是什么?)和高深知识的显现(高深知识怎么样传播和探究?)的边界基础上,重建高等教育哲学大厦。

一、高深知识的性质:划定认识论知识与政治论知识的边界

“每一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无论它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

基金项目:西北师范大学“知识与科技创新工程”项目(NWNU-JCXGC-K0303-1)。

作者简介:熊华军(1975-),男,湖北仙桃人,副教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大学教学。

梁晶(1987-),女,山东莱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大学教学。

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换言之,凡是需要人们进行理智分析、鉴别、阐述或关注的地方,那里就有大学。”^{[2]13}也就是说,高深知识是整个高等教育活动的起点,没有高深知识就没有高等教育。何谓高深知识?目前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布鲁贝克认为:“高等教育与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在于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在某种意义上,所谓高深只是程度的不同。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这种程度在教育体系的上层是如此突出,以致使它成为一种不同的性质。教育阶梯的顶层所关注的是深奥的学问。”^{[2]2}从布鲁贝克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高深知识的若干特征:①高深知识与其他知识的差别在教材的不同,高深知识的教材是深奥的。②正因为高深知识是深奥的,所以高等教育位于教育的顶端。③作为教育顶端的高等教育,其材料是高深知识。不过,这儿的“高深”只是相对的概念,也许500年前的高深知识到今天已经是基础教育材料。布鲁贝克进而将高深知识性质概括为两种——认识论知识和政治论知识。

(一) 划定认识论高深知识的边界

认识论高深知识是什么?认识论高深知识来自古希腊知识传统。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说,求知是人类的本性^{[2]69}。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求知有三个条件。第一是“惊异”,即人们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所表现出来的困惑和惊奇,想知道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背后的原因。追根究底并非为了实用的目的,纯粹是一种对智慧的热爱,对真理的追求。第二是“闲暇”。真正的古希腊人不用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这样的劳动由奴隶承担。他们也不用为生计而奔波劳碌,因为他们衣食无忧。正因为如此,他们时间和精力从事求知活动。第三是“自由”。就像亚里士多德说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求知不受各种目的和利益的支配,而是为求知而求知。即求知是自足的,它不以别的什么目的而存在,而纯粹是为了自身而存在,它要求自由地思考,自由地发表意见。总之,古希腊人更崇尚沉思的生活,而不是追求物欲的生活,“不要让积习迫使你,不要为盲目的眼睛、轰鸣的耳朵和舌头所控制,要凭借理解力来决断那些争吵不休的问题。”^[3]

认识论高深知识的不足之处。认识论高深知识以知识自身为主体价值,不涉及知识之外的社会现实,它千方百计要摆脱价值的影响。例如,培根以“蜘蛛”来比喻某些探究高深知识的学者。他们只知道闭门造车,自己在书斋里面冥思苦想,搜肠刮肚地“创造知识”,可惜他们这种知识是非常肤浅的,因为他们没有充分考虑社会价值与社会需要^[4]。如果学者在对高深知识永无止境的追求过程中一味将自己囚禁在象牙塔中,置社会和公众的需要于不顾,就会阻碍高深知识的发展和创新。

(二) 划定政治论高深知识的边界

政治论高深知识是什么?政治论高深知识发端于近代大学,以高举民族大旗的柏林大学为代表。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认为,人们探求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影响。它强调高等教育应该关注社会的要

求,高深知识的选择、传递、批判和创新是以实际问题为价值取向的。人们追求高深知识主要是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都是有限的。

政治论高深知识的不足之处。政治论高深知识是一种社会本位的价值观,其活动是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利益高于一切。一旦在高深知识的探究中掺杂有过多的政治与社会因素,就会严重威胁到人们对高深知识价值的信任。如果政治化发展 to 知识和权力不分的地步,高深知识会成为政治的附庸。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认为,大学是追求高深知识的殿堂,如果过分重视社会政治服务,会导致高深知识放任自流。大学的“专业是学术性的,是深深的扎根于文化和理想主义的土壤之中。专业的本性来自理智”^[5]。高深知识是为事物的探究提供理性的研究方法,而不是为追求眼前的社会利益。

二、高深知识传播的对象:划定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的边界

高深知识必须时刻关注它的传播对象,即高深知识由谁来接受、发展和传承。布鲁贝克认为,当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的阶段时,传统的精英和特权教育受到了挑战,高等教育不得不面临向谁传播的问题。

(一) 划定精英教育的边界

精英教育是什么?精英教育倾向于让教育服务于少数精英。这部分精英可能是由出身界定的精英,即贵族,可能是由证明的才智所界定的精英,即知识精英,或者将两类精英结合。无论何种精英教育,它们的共同特征如下:都只有少数人能够接受教育;学生接受的都是古典的课程;一旦学生迈上这一阶梯,就意味着获得走向上层社会的通行证。精英教育是培养某个人去养成与一定社会地位相符合的生活方式的教育。正如纽曼所说:“自由教育造就的不是基督徒,也不是天主教徒,而是绅士——具有有教养的才智,有灵敏的鉴赏力,有率直、公正、冷静的头脑、待人接物有高贵、谦恭的风度。”^[6]

精英教育的不足之处。精英教育与适应某一特定职业的专家的培养截然不同。精英教育试图灌输一种普遍道德与文化观念,努力塑造心智与情感、态度与品质,它追求纯粹的、基础的高深知识而不是应用的高深知识。“精英教育的高深知识是以学科专业为中心,主要研究一门或几门知识,高度结构化,不考虑社会、生活和学生自身对高深知识的需求。”^[7]由于现代社会结构与功能日趋复杂,单一的精英教育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

(二) 划定大众教育的边界

大众教育是什么?根据美国学者马丁·特罗(Martin Trow)的研究,如果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指标,则可以将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分为“精英、大众和普及”三个阶段。他认为,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时,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大众教育是一个量与质统一的概念。量的增长指的是适龄青年高等学校入学率要达到15%—50%,质

的变化包括教育理念的改变、教育功能的扩大、培养目标和教育模式的多样化、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与方法、入学条件、管理方式以及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等一系列变化。

大众教育的不足之处。大众教育所传播的高深知识更多的是反映政府、社会和市场需求,具有灵活的模块化课程,没有明确的知识结构体系,不能反映专业的内在结构。大众教育下的高深知识只是知识与技能的传播,不重视学生心灵与品质的塑造。奥尔特加认为,这样的学生是“有文化的野蛮人”,他懂得很多专业知识,但缺乏人道主义^[8]。另一方面,“如果人人都接受高等教育,就需要对迄今为止的那种为尖子而设的课程进行修改……但很快就有一些人因为达不到学业要求而退学。”^[9]¹⁶高等教育大众化易导致教育质量的下降,进而影响高深知识的发展。

三、高深知识传播的方式: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

由于高深知识的分化和迅速增长,今天的大学已无法培养昔日百科全书式的人才。布鲁贝克向高深知识的传播方式提出这样的问题:是进行以教育本身为目的的普通教育,还是进行以教给学生有用知识为目的的专业教育?

(一) 划定普通教育的边界

普通教育是什么?普通教育是指对所有大学生普遍进行的共同文化教育,即在整个教育中首先关注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和公民最重要的整个教育的一部分。普通教育源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自由教育思想。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是适合“自由人”的教育,而且他认为其教育目的与生存技能无关,而是发展人的理智、心智以及探究真理,不是为将来的职业生涯做准备,理论教育是自由教育的核心。赫钦斯认为,普通教育有培养人们五种理智方面的优点:直觉知识,科学知识,哲学智慧,艺术和审慎^[2]⁸⁶。

普通教育的不足之处。普通教育的理念臻于完美,但是在具体实行中却存在种种不足之处。学院或大学的作用是严格意义上的理性作用,即传授高深知识,充实学生的思想,而不是仅仅形成学生的道德习惯。“就美德具有理智内容而言,大学要提供条件对它加以阐明。大学要教授伦理史,甚至提供有关道德的哲学理论。但要清楚地认识到,仅仅承认什么是正确的决不能保证行为一定正确。纽曼说,知识是一回事,美德又是一回事。良好的意识并不是良心,哲学,不管它多么深奥,并不能控制感情。”^[10]

(二) 划定专业教育的边界

专业教育是什么?专业教育是给予学生某种职业能力的教育,它建立在专门化知识基础之上,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知识的专门化、学科的分化而产生,是为学生从事某一领域工作所需知识和技能做准备的高等教育。其主要目的是使学生获得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以此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为其谋生做好准备。这种教育基于实践,也基于研究,强调在实践研究中培养学生应用专门知识的能力。

专业教育的不足之处。专业教育重视学生技能的训练,忽视学生的情感与价值

的形成。如果较早地对学生进行专业教育,不利于学生根据兴趣选择专业,不利于学生性格和价值观的养成。如果专业划分过细和过窄,不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比如文科学生自然科学课程缺乏,理科学生人文社会课程缺乏。当专业教育源源不断地为社会加工出一批批没有个性、没有情感、没有自由,只求功利和物欲的工具人,奥尔加特就称这种人为“没有观点的人”^{[2]120}。因此,就有必要慎重反思专业教育的理念,找回遗失的对人性的关怀。

四、高深知识探究的主体:划定外在规范与内在信仰的边界

默顿认为:“科学的精神特质是指约束科学家的有情感色彩的价值观和规范的综合体。这些规范以规定、禁止、偏好和许可的方式表达。他们借助于制度性价值而合法化。这些通过戒律和儆戒传达、通过赞许而加强的必不可少的规范,在不同程度上被科学家内化,因而形成他的科学良知,……形成他的超我。”^{[9]61}在此,精神特指学者的外在规范与内心信仰的融合。

(一) 划定外在规范的边界

外在规范是什么?学者作为高深知识探究的主体,需要遵守外在的学术规范,恪守伦理道德准则,履行自己的职责。关于治学道德准则,布鲁贝克提出了四条。第一,学业精深是治学的标志。教师只有学识渊博才能以育人。第二,教授们应保留尽可能大的自治天地,该准则是学者治学应具备的内部和外部的治学制度环境。第三,学者要献身于自己的学科,这种献身精神要求理智上的彻底性,学者要做到为追求真理而奉献自我。第四,学者们要把发现公布于众。这一准则是对学者治学成果发布形式的道德约束和道德检验。

外在规范不足之处。如果学者往往靠外在的规范开展科学研究,那么,外在规范纯属是奥尔特加意义上的“机器”,学者是“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当“机器”运转的时候,学者不由自主地运转,完全丧失学者的批判和反思精神。同时,外在规范鼓励学者与学者之间竞争,导致“踏着他人的肩膀爬上去”现象的产生^{[11]363}。所以,一个真正的学者应当以内心信仰作为研究动力所在,他凭借内心对真知的渴望,弘扬高深知识的理想和价值。布鲁贝克说:“治学也有它非同一般的伦理道德。这种伦理道德标准从治学的对象即高深的学问中取得其特性。基于学者是高深知识的看护人这一事实,人们可以逻辑地推出他们也是自己的伦理道德准则的监护人。学者们是他们自己的道德的唯一评判者。”^{[9]63}

(二) 划定内在信仰的边界

内在信仰是什么?费希特说:“真正的、从事科学工作的感召力量,或者是开始于宗教,或者是通向宗教。”^{[2]141}杜威认为:“有一种东西,它对于智慧的信念变成了本质上是宗教的东西。”^[12]默顿从韦伯的观点——资本主义精神来自于新教伦理——出

发,考察了17世纪英格兰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后,认为英格兰的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来源于新教伦理,“一种宗教——我们把一种宗教理解为那些构成一个信仰和崇拜体系的伦理道德的信念和实践,也就是说,被理解为一种宗教伦理——可以间接地促进科学的开发。”^{[2]32}在这里,学者对宗教虔诚地信仰内化为对高深知识的信仰,凭借这种信仰,学者内心产生更广阔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催生一种人格力量,人格力量的完善引领灵魂的升华。凭借这种信仰,学者批判社会价值,引领社会道德,担当社会的良心。

内在信仰的不足之处。虽然内心信仰是学者探究的动力,但在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很多学者往往不能把持自己,丧失学者独有的品性。当前,大学教师的学术不端行为、重科研轻教学行为、兼职过多以至不能全身心培养研究生的行为、品德低下等行为,已引起社会各界广泛的争议,以至于阿什比说学术专业是一个“瓦解中的职业”^{[11]141}。基于此,美国科学院、美国工程科学院和美国医学科学院在《科研道德:倡导负责行为》这份报告中呼吁:“凡是接受联邦政府的科研及相关活动经费的科研机构,都必须有到位的政策和程序需要处理对不端行为的投诉。”^[13]

五、高深知识探究的方式:划定学术自由和学术责任的边界

高深知识的性质决定其探究方式需要学术自由,布鲁贝克认为学术自由是有限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责任是相辅相成的。

(一) 划定学术自由的边界

学术自由是什么?唐纳德·肯尼迪在《学术责任》一书中这样界定学术自由:“学术自由是指学者和他们的机构团体独立于政治干涉。正是学术界——而不是美国生活其它的领域——维护这样的权力,即异端思想和非常规的行为应该受到特别的保护。”^[14]学术自由的目的在于保护学者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不受外界不良的影响,最大程度地专心致力于自己的学术研究,最终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学术自由滥用的不足之处。布鲁贝克认为:“高等教育越卷入社会的事务中就越有必要用政治观点来看待它。就像战争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留给教授们决定。”^{[15]13}如果学者的言论过偏或过激,那么被影响的一部分社会就会盲从,有利于正常的秩序之外。并且无限制的学术自由很容易使高深知识的发展陷入狭隘和保守的泥潭,脱离社会的发展,最终丧失其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如当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运用,一方面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其负效应也不断出现,科学对人类的威胁也越来越大。如核战争问题、生物武器问题、环境问题等层出不穷。

(二) 划定学术责任的边界

学术责任是什么?什么是学术责任,可以引用唐纳德·肯尼迪《学术责任》一书中的定义:“学者承担着一种使命,这种使命的中心目的是促进人类的进步。……既

通过获得新的知识,也是通过传播已有的知识……使得社会变得一代比一代更好。”^{[2]24}也就是说,学术责任主要是发展高深知识和服务社会。世间没有无责任的自由,也没有无自由的责任,自由必须承担责任。所以,学术责任与学术自由共生共存。学术责任是大学学术传统自由的重要部分,社会赋予大学以学术自由,大学则必须履行相应的学术责任以回报社会。

学术责任的不足之处。如果学者承担过多的学术责任,首先可能会导致学术研究功利化。由于利益的驱动,部分学者学术生活的功利化倾向日益严重,许多学术活动都打上了经济利益的深刻烙印,学术的社会效益受到冷落。其次可能会限制学术自由,使得学者在探求高深知识时,受到不合理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制约高深知识向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

六、高等教育哲学:在高深知识的边界上重建

划定高深知识的边界,其目的是反思高深知识本质,以便在此基础上引导高等教育的发展。就像建构大厦一样,首先要夯实地基,如果地基不牢固,大厦也不牢固。所以,高等教育哲学的解构,就其实质而言,是为建构“打牢地基”,然后在此基础上重建高等教育这座“大厦”。既然高深知识的性质及其显现都具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因此,高等教育“大厦”应该是这些内在合理性的统一。

(一) 高深知识的性质:认识论与政治论相统一

现代大学已经逐渐走出“象牙塔”,实现“边缘中心化”,成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织,这就使得高深知识的发展既要保持自身的自主与自由,又要服务公众,服务社会。因此,认识论高深知识和政治论高深知识应该互相协调,互相融合。布鲁贝克认为:“大概把认识论的和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结合到一起的最好途径,是重新探讨当前关于知识本身的理论,价值自由的认识论的基础主要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认知论必须用实用主义的认知论作补充,这种方法大概可以使高等教育哲学的政治论和认识论之间达到最有效的和谐。”^{[15]86}按照布鲁贝克的观点,将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和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结合起来,也就是将其哲学构建的逻辑起点——高深知识的工具性和目的性统一起来。唯有实现认识论与政治论的统一,才能使高深知识本身赢得社会公众的信任,赢得社会与政府的大力支持,最终为自己赢得充足的发展空间。

(二) 高深知识传播的对象:大众教育和精英教育不可偏废

随着民主社会的发展和平等主义的盛行,接受高等教育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大多数人的一项权利。高等教育已不再是只提供少数人入学机会的精英教育,而是为大多数人提供更多的入学机会的大众教育。高深知识传播对象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使得高深知识本身、高深知识的传播和研究方式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以与之适应。在大众教育和精英教育之间,布鲁贝克没有舍弃其中任何一个,而是采用折衷的

办法。他把分成两级的高等教育称为第三教育,其中既有尖子大学,也有初级学院,还可以满足第三级教育在实际应用时的某种灵活性。他认为:“精英与大众是高等教育的两个体系,这两个体系是并存的,是不可互相替代的。”^[2]¹⁰⁴潘懋元先生提出,在大众化阶段有两种类型而不是两个层次的高等教育,即精英高等教育和大众高等教育。由此可见,精英与大众教育二者不可偏废,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三) 高深知识传播的方式: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许多职业已渗入理论成分,各行各业依靠经验方法行事已经过时,要求专业人员既能胜任工作,又能充分享受工作的欢乐,这就需要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相互融合。布鲁贝克认为,将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相融合,必须对学术课程的选择、组织、结构及其内容的逻辑和动机考虑作深入的分析,在课程设置上必须提供理智迁移、继续教育和职业教育中间培训的途径。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在概念探究方式方面打下一定的基础方能做到^[16]。现在的高等教育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之上的专业性教育,以培养各种专门人才为目标。它所培养的专门人才将直接进入社会各个职业领域从事专门工作。根据这一特点,实行通专结合有利于各门类的高深知识相互渗透相互融通,有助于培养更高层次的人才,进而更好地适应社会。

(四) 高深知识探究的主体:学者既要遵守外在规范也要坚守内心信仰

高深知识的探究和深入需要学者遵守外在规范,坚守内心的信仰。学者高尚的治学道德和强烈的信念,是促使高深学问得以深入的重要内部动因。学者守护着内心信仰,就是守护人类纯洁的精神家园,这也是大学成为指引人类前进的“灯塔”的原因所在,成为“社会的良心”所在。大学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假恶丑的抨击、对事物价值意义的关注、对喧闹浮华的社会风尚的学理探究,使其成为社会道德的使者,成为社会的一种维新向上的力量。它引领人们超越时代和社会的局限,对现实持理性的批判,并前瞻性地指引着社会的发展。

(五) 高深知识探究的方式: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的平衡

布鲁贝克认为,忠实于高深学问需要尽可能广泛的学术自由,但没有限制的学术自由也会成为灾难。因此学术自由是有限度的,还需要与学术责任相平衡。坚持学术自由有助于学者对事物的理性判断、严密和实事求是地分析,以便更好地追求高深知识。同时,大学的学者是献身社会,为社会探索真理的学者,应对社会负责。因此,学术自由里面包含着大学为社会服务的责任。所以,学术责任与学术自由相辅相成,学术自由总是受着一定规范的约束,这种规范指向学术探究,指向学术进步。

参考文献

[1] 彭富春. 哲学与美学问题[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214.

[2] 约翰·S·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M]. 王承绪,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

- [3] 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M]. 吴寿彭,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0:1.
- [4] 第欧根尼·拉尔修. 名哲言行录[M]. 马永翔,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569.
- [5] 约翰·科廷汉. 理性主义者[M]. 江怡,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4.
- [6] 弗莱克斯纳. 现代大学论[M]. 徐辉,陈晓菲,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23.
- [7] John Henry Newman.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M].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07:120.
- [8] 马丁·特罗. 从精英到大众再到普及高等教育的反思:二战后现代社会高等教育的形态与阶段[J]. 徐丹,连进军,译. 大学教育科学,2009(3):8-9.
- [9] Jose Ortega Y Gasset. The Revolt of The Masses[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32.
- [10] 罗伯特·M·赫钦斯. 美国高等教育[M]. 汪利兵,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7.
- [11] R·K·默顿. 科学社会学[M]. 鲁旭东,林聚任,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12] 费希特. 关于学者使命的演讲[C]//费希特著作选集(第五卷). 郭大为,梁志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559.
- [13] 克拉克·科尔. 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M]. 王承绪,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62.
- [14] 美国三院. 科研道德:倡导负责行为[M]. 苗德岁,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7.
- [15] 唐纳德·肯尼迪. 学术责任[M]. 阎凤桥,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 [16] 潘懋元. 精英与大众高等教育应统筹、协调发展[J]. 教育研究,2004(1):48-52.

(收稿日期:2011-01-07;编辑:杨万柏)

(上接第93页) 这一特点表明,中国向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转型必定是首先依靠政府自上而下推动改革,而中国政府近期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发展契机。对中国而言,向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转型只能依靠公办大学的改革,包括去行政化、大学自治以及教授治校,与国外一流大学合作办学,建立师生交流计划,引入完善的学生支持服务体系和国际标准接轨等。同时,还要引进国外的一流大学开门办学,大力发展民办院校,鼓励民营资本和国外一流大学联合办学,努力建立中国的一流民办大学,以此引入市场化的竞争机制,促使民办与公办大学的良性竞争,培育自下而上的自发的改革发展动力。唯此,我们才能留住一流的学生和人才,同时吸引国外的优秀学生和人才,实现双方的平等交流与互动。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印度高等教育的发展获得许多有益的经验与教训。

参考文献

- [1] Agarwal P. Higher Education in India: Growth, Concerns and Change Agenda[J]. Higher Education Quarterly, 2007, 61(2): 197-207.
- [2] 夏茂林. 印度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对我国的启示[J]. 高教发展与评估, 2009, 25(4): 71-79.
- [3] Chakrabarti, R., Bartning, A., & Sengupta, S. Developing Globally Compatible 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s for Indian Higher Education[J].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0, 14(2).

(收稿日期:2011-04-20;编辑:杨万柏)

so uses innovation policy to build a healthy external environment for university innovation. Meanwhile, such measures as organizational reform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re also adopted for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capacity of Sweden's universities.

Key words: Sweden; educational innovation; higher education innovation; cooperative education of production,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fining the Boundary of Profound Knowledge: Miss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

Xiong Huajun, Liang Jing

Page 101

Abstract: The miss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 is to define the boundary of the profound knowledge. In Brubacher's opinion, either the epistemology or politics profound knowledge has its rationality and defect. Both the elite education and mass education have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Neither general education nor professional education can be replaced. It's lopsided if the scholars only comply with external standards or adhere to the inner belief and only pay attention to academic freedom or academic responsibility. Brubache holds that the epistemology and politics profound knowledge should be unified and the elites and mass both should be considered. Brubacher advocates the integration of general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cademics should stick to both the external standards and the inner belief. At the same time, academics should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 freedom and academic responsibility.

Key words: profound knowledg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 academic standard; scholars belie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general education

Folklore-oriented Reform of Collegiate Art Education

Zhang Ou, Wang Tian

Page 110

Abstract: Contemporary collegiate art education faces the following problems: single education mode, narrow route to cultivate talents, and weak innovation ability. However, the primordial nature, healthy emotion and simple style in folk arts can make a contribution to the reform of collegiate art education. Base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art education and the teaching experiences, this paper presents three pieces of advice. Firstly,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art major should go from the campus to the folk and to the primordial folk arts. Through field research, they can not only help construct regional culture, but also perceive the folk art deeply and improve their humanistic quality. Secondly, the university can adopt "1 + 1" teaching mode, inviting folk artists to teach in the classroom, into the teaching staff and students and asking them to tell their bitterness and sweetness during creative work in plain words so as to make up for the inadequacies in theoretical teaching. Thirdly, based on investigation and making full use of regional humanistic art resources, the faculty and students can convert inexhaustible folk art into teaching resources and thus change the convergent phenomena in art major and promote humanistic quality.

Key words: art education; folk art; art; teaching reform